

※俄蘇東方學系列之阿列克謝耶夫專輯：「新」中國批判※

## 俄蘇東方學系列之阿列克謝耶夫專輯： 「新」中國批判導言

陳相因\*

### 一、源 / 緣起：紀念全俄羅斯科學院李福清院士

這一專輯內所有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後簡稱阿氏）以俄文寫成的文章，包括由他的女兒班科夫斯卡雅（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1927-2009，後簡稱班氏）所著的后序，是由作為俄文責任編輯的全俄羅斯科學院李福清院士在二〇〇九年提供給筆者。李院士當時表示，希望我能夠將阿氏研究「新」中國的一些想法和論文翻譯成中文，讓華文界的讀者能夠更進一步認識這位大師，同時瞭解俄蘇東方學在這方面所做的學術貢獻。

二〇〇八年春天，李福清院士曾受筆者邀請，至中研院文哲所演講，闡述自己的學術生涯與研究成果。當時我博士畢業不久，一個初出茅廬、默默無聞的小毛頭，一心只想開展自己新的研究計畫，不曾深思「染指」俄蘇漢學翻譯這一領域。正是那一年的夏天，我回俄羅斯國立聖彼得堡大學東方系開會、發表論文，與會的李院士對我所做的中俄比較文學研究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加上我過去彼得堡大學語言系的背景，聊起來十分投緣，我們之間的互動更為熱絡。見面時，李院士總一再地鼓勵我，一定要繼續我所做的中俄比較文學研究，因為他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значительный）；沒見面時，他也常常熱情地來信，郵寄許多俄國漢學資料給我，並透過我與中研院人文學科各所交換出版的研究書籍與資訊。

又隔一年春天，《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刊登了「知識和權力的畛域：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研究初介」專輯<sup>1</sup>，李福清院士收到我寄去的《通訊》後，回信顯得

---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

<sup>1</sup> 陳相因編譯：「知識與權力的畛域：俄蘇東方學與捷克漢學研究初介專輯」，《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十分高興。完全不因我這個「黑毛丫頭」在導言中竟如此大膽，敢對過往的俄蘇漢學研究具有相當的批判意識而感到介意或不愉快。他甚至回寄給我更多書籍與諸多研究資料，當中就包含了這一專輯的俄文影本<sup>2</sup>，希望我能為這些書籍寫書評，並翻譯阿氏的「新」中國研究。前一項他交代的任務，我是如期完成了，而且也因為李院士的開放態度，讓我能放膽、放手地針對這些俄文書籍做批評<sup>3</sup>。

然而，早在二〇〇九年筆者答應李福清院士的後一項期望，卻來不及達成。對此，我當然責無旁貸，這一專輯的翻譯活動，套句阿氏的話語：「是從自我原諒開始。」<sup>4</sup>原本寄望二〇一一年底完成，或許能紀念阿氏一百三十週年，並呼應胡適一百二十週年的冥誕。但從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二年，本專輯的翻譯進行得斷斷續續、缺乏動力，這當中有不少原因。主要理由除了翻譯不是我的本業，我也不能免於「庸俗」地向制度妥協——認為翻譯這種苦差事，既不算個人的研究成果，亦不能為事業增添助益。另外，還有不得不提的隱情：原先預計，將本專輯的幾篇文章分別由幾位國內俄語本科畢業的碩士生與我共同合作。但寄回來的翻譯結果，若是僅看中文本身，文字之優美流暢、自成邏輯，讓我一度誤以為專輯可以如期完成。然而，當我逐字逐句地校對每一篇時，卻發現這些翻譯不但全錯，還錯得十分離譜！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而言，本專輯第三篇文章標題「十月革命」，竟翻成了「辛亥革命」，也因此全篇凡是「十月革命」，都成了「辛亥革命」，如此最基本的單字竟都能犯錯，遑論更多文法錯誤的問題，簡直不勝枚舉。通篇校對下來，其文字之「達」與「雅」徒增其「全然不信」，整個專輯慘不忍睹。這樣慘痛的教訓讓我明白，

---

第 19 卷第 1 期（2009 年 3 月），頁 1-58。

<sup>2</sup> 這一專輯原名「新中國等於舊加新……」（Новый Китай есть старый+новый. . .），收錄於 В. М. Алексеев, *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 Составитель М. В. Баньковск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Б. Л. Рифтин, 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3. Книга 2, с. 269-398。但由於當時李院士手上已經沒有這一套共兩本書的存貨，市面上也買不到，故先寄了一份影本給我，希望能藉由我的翻譯，讓中文讀者更進一步瞭解阿列克謝耶夫的研究。很幸運地，筆者透過俄國網路書店替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蒐羅了這一套在全俄羅斯只印刷了一千兩百本的兩冊論文集。

<sup>3</sup> 參見拙作：〈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ма о поэте стансы Сыкун Ту (837-908): перевод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1 期（2009 年 2 月），頁 42-43；〈Духовная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Язык 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в пяти томах, т. 3. (中國精神文化大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4 期（2009 年 3 月），頁 336-344。

<sup>4</sup> 見本專輯後序，班科夫斯卡雅著，陳相因、王上豪、徐子芳譯：〈必也正名〉，頁 140。

翻譯從基本教育著手到經驗執行這一事業是多麼重要，也不禁開始懷疑，坊間究竟有幾成的翻譯作品能相信。如果阿列克謝耶夫地下有知，自己的論文被翻譯成這個樣子，套用他自己的話語，不知該多麼「抓狂暴怒」！我也只得忍痛把這些研究生的「成果」盡數刪除，自己跳下翻譯這無邊苦海，一字一句地親手重新來過。自己的本科研究已然十分繁重，翻譯副業就這麼一拖再拖，又是一整年。

直至二〇一二年十月俄國方面傳來李福清院士仙逝的消息，讓我震驚、難過不已，也對自己答應他的這件事情沒能在他生前完成，一直愧疚在心。當筆者開始收拾悲傷的心情，認真著手完成這專輯所有文章的翻譯，已經是二〇一二年年底的事情。很幸運地，在這段期間，此翻譯計畫增添了一位助理王上豪，正在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研究所攻讀碩士。他認真負責的態度與俄語程度，讓我對本科學生重拾了些信心。另外，也很感謝這麼多年來一直跟著我做研究的幾位助理，忍受我一再地要求和挑剔，他們分別是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畢業生徐子芳、輔仁大學語言所碩士生周代侖及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劉芷瑋。同時，也要特別感謝我在文哲所的同仁楊貞德博士，在胡適研究方面給予這個專輯許多建議。因為在上述幾位的協助之下，這個專輯才得與中文讀者見面。希望以此專輯，除了紀念阿列克謝耶夫院士和她的女兒班科夫斯卡雅女士（2009年逝世）以外，更緬懷李福清院士，感謝他一直以來對推動臺、中與俄三方交流所做的努力和貢獻。希望能藉由這個專輯的發行，讓更多人認識俄蘇漢學，以告慰他們三人在天之靈。

## 二、阿列克謝耶夫生平

在介紹專輯之前，我們得先認識阿列克謝耶夫此人。班氏在《1907年中國紀行》前言與本專輯的後序，對阿氏的背景、經歷、喜好與個性等方面，皆有詳盡的介紹。整體而言，簡體中文網路百科提供的阿氏資料算是完整，重視前蘇聯學術成果的中國大陸中文學界，甚至是文藝界的老派也皆熟悉阿氏。相對而言，他們普遍比臺灣學界更知道阿氏，也更明白這層道理：欲知前蘇聯與當今俄羅斯漢學的發展，必先瞭解阿氏<sup>5</sup>。正因為前面的中國學者與文藝工作者的努力，不少阿氏的個

<sup>5</sup> 俄國漢學家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L. N. Men'shikov) 與中國斯拉夫研究學者李明濱兩人，都將阿列克謝耶夫列為二十世紀上半葉蘇聯漢學的劃時代人物與奠基者。詳見 L. N. Men'shikov, "Academician

人與研究資訊已經翻譯成簡體中文，在此原不必多言。但我主要從這些已被翻譯的「常識」之內，對照俄羅斯科學院提供的俄語資料，找出臺灣讀者與研究者較少得知或未曾提及的部分，加以統整、扼要介紹。

阿列克謝耶夫，中文名字為阿理克，一九〇三年畢業於彼得堡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並於一九一六年完成著名的碩士論文〈中國詩論：論司空圖的《詩品》〉的答辯。一九二三年晉升全蘇聯科學院通訊研究員，六年後當選為全蘇聯科學院院士，且成為北京國家圖書館的通訊成員。阿氏因其博學多聞，被郭沫若譽為「蘇聯首屈一指的漢學家」，尊稱「阿翰林」。班氏在本專輯的後序中，描述自己的父親如何不懂幽默。但如果看到阿氏親自為自己墓碑銘刻的漢字對聯（竊以為，這應是他第一次跟法國漢學家沙畹到中國考古時所受的影響），成為他的自我寫照：「誠意格物心寬體胖」、「孜孜不倦教學相長」，橫批以石書內刻「不慍」二字，中文讀者當會不禁莞爾。

班氏與中國學者較少提及，除了前述的碩士論文，隨後不久即以專書的形式出版，但阿氏廣為後人所知、鏗鏘有力的專書著作，多數則在他過世、有些甚至等到蘇聯開放政策與解體之後才出版<sup>6</sup>。當中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政治。阿氏活在史達林主義的陰影下，當時在蘇聯學術界最能明哲保身的幾個方式，不是對語言學本身的研究，就是對從古文明到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之前任一時段文學、文化與語言之間的論證。從彼得堡到後來莫斯科—塔爾圖語言學派的發展，這種政治影響的斧鑿痕跡比比皆是。為規避審查人員在政治上的刁難（在某種程度上是嘲諷這些人的智力與知識程度），有些文本分析趨向極端專業數理化，文字艱澀難懂，論文內一堆數字與公式猶如密碼，以羅特曼 (Ю. М. Лотман, 1922-1993) 為首的塔爾圖語言學派為最。顯然地，阿氏在史達林主義氛圍下，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到其生命終結之日，就檯面上的學術成果來看，亦不能免俗地將自己的研究矛頭指向語言學的辭典編纂、《詩品》和《聊齋誌異》的翻譯。儘管如此，在政治大清算的年代 (1934-1938)，

---

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 (1881-1951) and His School of Russian Sinology,” *Europe Studies China* (London: Han-Shan Tang Books, 1995), pp. 136-148；李明濱：〈阿翰林的學術成就——紀念蘇聯漢學的奠基人阿列克謝耶夫院士誕辰 110 週年〉，《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1 年第 6 期，頁 118-121。

<sup>6</sup> 舉例而言，如：《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М.: Наука ГРВЛ, 1978)；《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М.: ГРВЛ, 1982)；《Труды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2 книгах.》(М.: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阿氏這些在二〇年代涉及「新」中國研究的文章，也被拿出來一一檢驗，但他比他的漢學家同事們（例如，加拉罕與什圖金，詳見本專輯後序）幸運，躲過了槍決和流放。儘管在寫於蘇聯解體後的〈必也正名〉專輯後序中，班氏極力為她的父親，特別是在指涉他只做傳統中國研究的這一謠言上「去標籤化」，但是她是否曾想過一種可能：或許別人貼在她父親身上這「食古」的標籤過於鮮明，且勢必牽涉政治的新中國研究各項議題又十分敏感，導致以中國傳統詩學聞名的阿氏，反而能活過腥風血雨的一九三八年？

然而一九三八年那樣「幸運的」標籤，又隨著蘇聯內部政治與國際外在環境的變遷，在一九四九年轉變成為另一面極端的意義。隨著「更新的」中國成立在即，阿氏的「新」中國研究，缺乏與中蘇兩國共產黨文藝政策亦步亦趨的研究觀點和腳步，「食古」已不再是一種護身符，反而成為「不化」的象徵。隨之而來的「世界主義」、「唯心主義」與「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種種標籤，牢牢地貼在他身上，成了他最後的催命符。於是，逃過一九三八年那一劫的阿氏卻無法逃過一九四九年，滿腹冤屈的他在一九五一年因罹癌而溘然長逝，這也是為什麼班氏在本專輯的後序中必須為父申冤，寫下〈正名〉一文。

### 三、阿氏文藝理論的遺產與重要性

本專輯內文共有七篇，除了筆者撰寫的〈導言〉與〈俄蘇東方學之跨學科文藝批評與比較文學方法：論阿列克謝耶夫的《1907年中國紀行》〉之外，阿列克謝耶夫所著的論文排序，主要依據李院士給予的俄文原稿。將《1907年中國紀行》一書評論放在阿列克謝耶夫的專輯之前，主要依據原文專輯的編輯邏輯，希望能在時間前後流動的過程中讓讀者察覺，阿列克謝耶夫從遊歷「舊」中國的日記到一系列「新」中國研究的批判，其實具有連續性。但是，當中呈現的學術觀點、思想與方法論則呈現細微的轉折，是層次鮮明卻又精緻的動態演變。筆者的書評與班氏後序一文，業已詳盡地介紹阿氏，不須贅述。阿氏所著各篇亦有班氏原序，詳述其文主旨與創作背景。因此，此導言主要乃針對專輯結構，以及其文藝理論的遺產與重要性，進行更深入的說明。

首先，阿氏在《1907年中國紀行》一書當中指涉年畫、中國歷史、民間傳說與民俗文化等研究，一直是他的學術理想。然而，阿氏終其一生在檯面下盡其蒐集

材料之能，卻未竟檯面上出版研究之功；如前所述，這當然與他生前所處的政治環境與學術體制習習相關。儘管如此，隨著赫魯雪夫 (Н. С. Хрущев, 1894-1971) 上臺後，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開始的「解凍時期」(Оттепель)，一連串的去史達林主義化 (De-Stalinization) 效應到蘇聯解體之後，時至今日的俄蘇漢學、東方學與世界文學等領域中，仍可以看見許多阿氏的學生，如孟什克夫在其文章中所一一羅列的十幾位當代學者，分別投入阿氏生前提出的研究版圖、宏大事業裏，成為承繼阿氏學術理想最為鮮明的例證<sup>7</sup>。舉例而言，國內學界對於李福清院士的研究並不陌生，他在華文學界出版了幾本以中文寫成的專書<sup>8</sup>，文字俐落明瞭、分析深入淺出，皆獲好評。然而較少人知道，身為阿氏晚年嫡傳弟子的李院士，其研究方向、題目與方法受他老師影響至深。這些李院士在其研究自序<sup>9</sup>中曾一一闡明，在此毋須贅述。

其次，在〈墮落退化的與革命進化的中國文化〉一文中，阿氏則提出一個相當有趣且值得注意的「庸俗」，作為一種「民族學的現象」來研究。儘管阿氏在日後的著作中，並未針對這一現象做更深入的探討（再次，又是政治因素干擾），但最有趣的是，他在理想中對中國「庸俗」(пошлость)的這一研究論調與可能引發的方法論，卻被將近一甲子以後的英美斯拉夫研究學者，同屬彼得堡大學畢業的薄茵 (Svetlana Boym) 體現在其蜚聲文壇的專書中，用以研究蘇聯的日常生活<sup>10</sup>。筆者確定阿氏與薄茵對「庸俗」看法雷同，純屬巧合<sup>11</sup>，說明了兩位學者獨具慧眼，能在中俄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到常人看不到的細微之處。但進一步細思，我更相信在這巧合之中，定有某種關連能夠串起中俄之間的比較文學與文化研究，值得我們去深思

<sup>7</sup> L. N. Men'shikov, "Academician Vasilii Mikhailovich Alekseev (1881-1951) and His School of Russian Sinology," *Europe Studies China*, p. 138.

<sup>8</sup> 李福清院士著作等身，在此僅列幾部重要著作與阿列克謝耶夫研究相關者，供讀者參考。《中國神話故事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年）、《李福清論中國古典小說》（臺北：洪葉出版社，1997年）、《從神話到鬼話》（臺北：晨星出版社，1997年）、《三國演義與民間文學傳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東干民間故事傳說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等等。

<sup>9</sup> 李福清著，李明濱編選：〈我的中國文學研究五十年〉，《古典小說與傳說：李福清漢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1-15。

<sup>10</sup> Svetlana Boym, *Common Places: Mythologies of Everyday Life in Russi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up>11</sup> 筆者與薄茵教授熟識，知道她不諳俄蘇東方學或漢學。

與深入探索。又或者，未來能有同時精通中、俄與德文的研究者，可更進一步將這種「庸俗」現象與關注極權主義的著名學者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1906-1975) 所強調的「邪惡的庸俗」(或譯邪惡的平庸, the banality of evil) 並列研究，開展二十世紀中、俄與德之間，更精闢且深入、宏大而寬闊的比較視野。

接下來的兩篇關於胡適創作與研究論述的論文，分別為〈中國詩歌語言的改革：以胡適教授的《嘗試集》與附錄《去國集》為準繩〉及〈胡適的儒學研究：在中式綜合法下的孔子教義〉，是阿氏關注新中國文藝與學術的發展，並說明他絕非「食古不化」的直接證據。在兩篇論文中，阿氏充分展現他在彼得堡大學語言學學派與其形式主義的教育之下所學得的方法論，以文本為主、科學概念（這兩篇裏主要是統計）為輔，對其創作與研究進行質化與量化的分析。後文則以介紹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的〈孔子〉一節，並對他研究的優缺點，提出自己的評論和看法。阿氏一派的徒子徒孫，多依此法探究文本，李福清院士的不少著作即可看出這一學術脈絡。

從上述兩篇研究胡適的論文來看，可以得知，阿氏以胡適作為「新」中國的代表人物，更將他所推行的「五四運動」視為「新」、「舊」中國的分水嶺，這一看法中俄共享，並無太大的爭議。然而，阿氏的主要論點乃貫徹他在〈墮落退化的與革命進化的中國文化〉一文中所提，所謂「新」中國、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與「五四運動」，其實是「油煎包子裏什麼內餡也沒有」。對胡適與其代表的「五四運動」、「白話文運動」與「新」中國提出強烈的批判與質疑，是阿氏的學術觀點當中最為與眾不同之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斯拉夫漢學界，在阿氏這一學術觀點上的相似性。不僅只有阿氏一派的俄蘇學生們，在日後東方學與漢學的發展中，持續深化阿氏這種論調，以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 為首的布拉格漢學派，也能找到不少類似的蛛絲馬跡，他的《中國——我的姊妹》一書也對「新」中國提出諸多批評。正因為受蘇聯教育的捷克漢學家熟習俄文，不少普實克的徒子徒孫，例如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即使流亡海外，仍舊關注俄蘇東方學與漢學的發展，並於一九九二年在臺北舉辦的一場國際研討會中，撰文介紹阿列克謝耶夫對胡適新詩的研究視角<sup>12</sup>。她更進一步承繼阿氏與普氏對五四運動的評論遺產，將批判與質疑帶

<sup>12</sup>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European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urope Studies China*, pp. 369-371, 385.

入一九九四年在布拉格舉行的一場國際研討會「五四運動的重擔」(The Burdens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中，與中研院李歐梵、王德威與余英時等院士展開學術交鋒，促成《文化資本的挪用：中國的五四方案》(*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sup>13</sup>一書。

由上述來看，阿氏不僅提出了相當廣泛的學術範疇與研究領域，同時也著手十分具體的文本分析。阿氏的這些學術成果與貢獻，透過前述直接和間接的傳播方式，在捷克與英美漢學界遍地開花結果。

#### 四、終結與不滅

本專輯當中，阿氏所著的最後一篇〈十月革命映照了中文和中國文學的演變與革命〉，字裏行間暗示著他是如何在蘇聯政治掛帥與審查制度之下，尋求一種與自己學術理想平衡，且能被當局接受的論述嘗試。正是在閱讀此文之際，筆者恍然大悟，李福清院士為何要將翻譯阿理克這一「新」中國研究專輯的重責大任託付給我的主要原因，畢竟中國大陸不少學者專精俄語。不論是阿氏的弦外之音，抑或班氏在蘇聯解體後編輯此專輯時所附的各篇前言與後序，都表現出這對父女、兩代俄蘇漢學家，對共產黨統治下的學術體制與審查制度是如何地深惡痛絕。雖然李院士將這些稿件交付予我時，什麼政治言語也沒多說，但是此專輯中呈現的文字，俄文的用字遣詞與修辭色彩，我相信只有交給今日能享有完全的學術自由的我們，才得以保全、如實翻譯。我感謝李院士對臺灣學界與我的信任，也希望藉由這一專輯的出版，能不負他晚年所託。

此專輯內所使用的許多俄文學術用語，或者是思想表達，對俄語讀者本身已屬不易，翻成中文時，即便經過反覆推敲與查閱的過程，原意流失或者疏漏亦在所難免，懇請先進與同行們不吝指導、指正。

<sup>13</sup> Milena Dolezelova-Verlingerova and Oldrich Kra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